

营造学社：远去的名，不朽的功

专访刘敦桢之子、著名古建园林学家刘叙杰

口述：刘叙杰
整理：本报记者陈席元、曹瀚尹（实习生）

中国营造学社，一个逐渐淡去的名字，曾经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当年的成员们目前恐已全部离世。大约在1936—1943年间，由于特殊的机遇，我有幸接触到这一著名学术机构以及它的若干重要成员。因为当时年纪小，所见所闻以及与学社成员们的接触大多是生活上的，对于他们多年来在学术创造上的事几乎全不知晓。

对于学社的首次印象，大约是在1936年夏，母亲因事去找我父亲，趁便也带上了我，那天是人力车送我们到天安门西朝房学社办公地点的。进屋后发现室内很凉爽，往来走动的人员很少，只有几位坐在依墙的大桌前工作，这与我后来在云南昆明麦地村和四川南溪李庄学社绘图室中见到的情景一致，所以印象深刻。

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至于日后在那两段岁月中的见闻，也大多是生活中的琐事，在拙作《脚印·履痕·足音》中亦有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那时虽然生活平淡无奇，但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是某日我和小弟（梁思成先生之子梁从诫）来到学社工作室，看到墙上挂了一张大图，是陈明达先生刚绘成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纵剖面图，十分壮观精致，当时在场的除作者外，还有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诸先生，一致称赞叫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幅的手绘墨线实测图，内心十分惊讶与敬佩，也许就是它为我多年后选择人生道路铺上一块厚重的大基石。

第二件事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小弟跑来要我同去看“热闹”，原来是学社的几位单身汉正集体外出，只见他们在村外的田埂旁一字排开，坐在带来的小凳上，又拿出画板、颜料、水瓶和画笔。这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学社中的绘图从来都是用墨线，这次虽是野外写生，但目的何在？这样的集体活动只见到一次，也未被学社纳入正式的工作内容，但从此孕育了一位天才水彩画家，他就是莫宗江先生。多年后，看到他笔下幅庄镇门风景图（约作于1945年），我十分感慨，想不到他竟然在两三年间就能达到如此精湛的技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不起眼的“平常”作为

对营造学社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还是在我进入大学之后。特别是自己讲授中国古代建筑史时，由于备课中拜读了学社诸前辈历年撰写的著作，使我深为敬佩和折服。回忆起他们在极为艰难困苦条件的下仍然忘我奋斗，表现了中华学人的大智大勇，以及崇高的爱国与敬业精神，至今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当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为营造学社的辉煌成就热烈庆贺之际，最早的开疆拓宇之人，并未为大家完全知晓。这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老先生。我也同样粗心，当年未对老先生做进一步的了解。日后才知晓那些不起眼的“平常”作为，才是他最终胜利的铺路石。

朱启钤（1872—1964年），贵州省开阳县人，幼年丧父，后经姨父瞿鸿禨培养，并荐举入仕，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及代总理。他很早就对我国传统建筑深感兴趣，提倡研究中国传统工程技术和相关工艺，决心建立一个专业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招聘良才，为此做出了长期艰辛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达成了矢志奋斗的目标。

他是一位旧社会的文人和官僚，放弃已有的优裕安闲生活，走上开辟“新天地”但前途未卜的险路，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对我国传统建筑传承事业的热爱，不仅出于个人的原因。通过多次外出赴欧洲诸国及日本考察，对比国外的种种情况和措施，必然也会对他有所启发，进一步坚定他实现理想的决心。

朱启钤对我国传统建筑特点的认知是全方位的。不仅在于建筑本身，还扩大到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甚至工艺美术诸多方面。如此宽阔

中国营造学社，一个逐渐淡

去的名字，曾经为中华民族传统灿烂的建筑文化立下丰功伟绩

我们要继承的是前辈们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

的视野，在旧社会中自然是凤毛麟角，就是我们今天的建筑工作者，也未必人人能做到。

朱老先生努力收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例如建筑构件、工匠工具，师徒世代相传的钞本和口诀……这些都是重要文物，同时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对象。由于他的关注，1919年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中，发现了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手抄本，这对宋代重要建筑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托。

他曾收集圆明园遗址中残存的建筑构件，运至中山公园内展览，既宣扬了中华建筑的辉煌，又讨伐了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气节。

作为一位旧文人而不是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学者，他也在运用自己的文史知识进行若干研究，例如日后发表的《哲匠录》等。在旧社会，文人常常是统治者的工具，特别是取得一官半职后。当时，从事艰苦劳动的人群总是被列为社会的最下层，建筑工匠也不例外。朱启钤对历代工匠使用的工具和劳动手册传承十分重视，其改进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关键在于操作的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朱老先生的与众不同。

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华讲演，对提高国内某些方面的认知很有帮助，这一举措也是中国旧文人从不措手的事。

通过长期全方位的积极努力，营造学社得到国内外的众多支持，特别是1929年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暂定三年、每年国币一万五千元辅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在1930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学术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首座里程碑。

要正式开展工作，必须招募人才。社长朱启钤通过多方了解并慎重考虑后，于1931年引进了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梁思成先生，不久任命其为法式主任。1932年又延聘了我的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刘敦桢先生（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为文献主任。两位归国学者既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又都具备相当深厚的国学底蕴，这对开展学社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不久后的事实证明，朱社长的慧眼识人，收到了极佳效果，两位主任不但个人业务能力超强，而且配合密切、相得益彰，这样的关系使得二人成为数十年不渝的密友。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学社对外又招了一批年轻人作为辅助者，日后大名鼎鼎的陈明达和莫宗江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年轻人大多是中学学历，但能力强、肯吃苦，又很虚心学习，所以进步极快。通过三年左右的实际操作，逐渐成为田野测绘工作的能手。另有几位则是大学学历，也有一定的文史研究水平，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在《汇刊》上发表若干篇短文，但田野考察工作就相对减少和不足了。

史诗般的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但帝国主义的野心并未因此收敛，逐步向华北扩展，除了亲自动手，又收买卖国求荣的汉奸。此外，还千方



▲刘叙杰近照。唐瑛摄

百计地进行分化，曾留学日本的学者，就成其目标。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父亲身上，当时就有人“邀请”他去承德，为日伪修避暑山庄，代价是六位数的银圆，父亲当即将此信送呈朱老社长。

战火即将蔓延，许多人离开北平南下。但营造学社的工作必须继续，为了尽快开展尚未完成的调查，社里决定文字史料方面的研究，由两位主任进行的一律暂停，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大家的努力，任务终于大体完成，有关资料都运返北平，并进行及时处理，但大量原始资料 and 已经整理等待付梓的稿件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此项工作恐怕是老社长最为揪心和全社员工最为关切的事情。依朱老社长的处事风格，他一定早就做好了预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就占领了北平城。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杨廷宝先生、梁思成先生和我们三家，一同离开北平，抵达天津，后来又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但此时的朱老先生，却因为种种不得已而留在北平，学社其他人员也大多如此。后来只有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三位涉险来到湖南长沙，与梁先生和我们汇合。重新集结的这六位成员，在日后的继续奋斗中，同样做出了史诗般的巨大贡献，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营造学社的光彩传统。

后来得到消息，原留存于北平学社中的若干文稿及有关资料，已被送往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保管。这使身在后方的学社社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根据我的记忆，营造学社于1942年初由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后，曾对战前已调查的若干项目作了可供出版的全面整理。例如发表在《汇刊》第七卷一、二期梁思成先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七卷二期莫宗江先生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它们的原始文字和测绘草图从何而来？有如下几种可能：一是文稿和草图由作者离开北平时随身带出（须单件面积小，重量轻，且为数不多）；二是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离开北平时带出（条件同上）；三是已存天津，托人携带至上海（乃至香港），再转内地。

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和后方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通邮，但附有许多限制。例如汪伪区寄到大后方的信件，收信人只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不能在何方政府机构任职。国立学校的教师或学生亦在其列。而书信的内容，自然是“莫谈国事”“只聊家常”。

例如1943年春，我家由李庄迁至重庆，当时父亲就尚在北平的朱老社长写了封报平安的信。过了许久，才收到老社长的回复，但收信地址，不是父亲供职的中央大学，而是他在某地的一位亲戚家。

从这里也可得知，虽然学社已一分为二，但仍互有联系，只是次数不多，表达方式也受到限制。但朱老先生对学社工作的关怀不断，乃是不争的事实。

学社人员千辛万苦获得的调查资料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例如存放在天津英国银行中的资料，就因水患而损失惨重，仅挽救出少量。此外，零星遗落在北平各处的，恐也有一定数量。在解放初

期，罗哲文先生就告诉我，曾经在“文整”（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仓库里，看到一包学社的文稿，具体内容他不知晓，要我去了解一下。我前往并询问了负责保管的李淑琪同志（陈明达先生夫人），她说不知此事。

不幸中之大幸

2006年，在北京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库房中，发现一批营造学社文稿，包括父亲撰写的四篇：《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8550字），《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42102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30510字），《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7035字）。梁思成先生的一篇：《山西应县佛宫寺塔》。经核查，父亲这些著作约成于1936年，是当时学社准备发行的学术专刊《佛塔》的内容，计划由两人各写五座塔，后因抗战爆发，未及刊行。

此部文稿发现时，我正在整编《刘敦桢全集》，得知消息当即恳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协助提供，承蒙张廷皓所长、杨欣、查群女士及刘志雄先生大力协助，将四篇稿件影印件给我。文稿均用学社抗战前习用的稿纸，并以毛笔写就。标题下有作者署名，而写稿的毛笔字迹确系出自父亲之手。此文稿是否即罗哲文先生所云者，尚不能认定，但此物自何人何人之手，也早已成为疑案。推测此五篇可能是当时散失于北平的遗物，虽仅残存半数，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亦有慰作者在天之灵矣！

朱老社长不辞千辛万苦，多年竭心尽力，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现在：首先，为我国建立了首座系统调查研究中华传统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其次，为我国科学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弥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并争得了世界荣耀；第三，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学术人才，其领军者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由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第四，创造了一整套高标准、高质量而又易于推行的古建筑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和准则，为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开展古建科研、保护工作树立了标杆。

中国营造学社的出现，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当时中国积弱，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部经济不发展，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营造学社的成立，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辉煌中国建筑文化。首先通过调查，摸清家底，然后再进行修整保护，而后面这个目标，当时完全没有可能施行。因此营造学社当时主要任务，只是尽可能完成整个工作的第一部分，而作为第二部分的全民保护，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实现的。

现在，外出调查使用的器材和手段更加先进和便利，测量、绘图等都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可使用航拍……物质条件已不成问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是目前成败的关键。我认为在解决了物的问题后，要继承的是前辈们那种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

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这不仅是营造学社的先辈，更是我们的祖先，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所做出的榜样。

■访谈

草地：您就是社会心态是随着时代而变的，每个时代的建筑也可以作为当时社会心态的一种呈现。有一阵，全国多地出现过不少“奇葩建筑”，有些且不说功能，光是审美上就难以让普通人接受。您是耄耋之年的长者，可否从您的阅历来谈谈，各个时代的建筑，与社会人心变迁之间的关系？

刘叙杰：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何种社会，建筑都是为人服务的。出于不同的使用要求，建筑也形成了多种类型和变化。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人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对建筑评价制定了三条原则：实用、经济、美观。我认为这三条原则，也可沿用到世界各国各地，现在举几个例子。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被众多媒体誉为世界上最有特点的优美建筑之一，其外观造型的确别出心裁，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它原来的设计功能是一座音乐厅，但这一功能至今仍未能很好实现。其次，原设计的“风帆”外形，在结构上出现问题，所以必须予以加固，从而使其外观发生变化。

依前述建筑评价三原则，第一、第二项都出现严重问题，未达到原来设计要求，其设计成败自见分晓。

法国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作品，也被列为世界著名建筑之一。它采用了钢架结构和钢化玻璃材料，造型酷似埃及金字塔，应用功能也好，上述三个原则基本符合。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协调性”不够。卢浮宫的建筑造型是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宫廷建筑的产物，而开罗金字塔则是古埃及的帝陵，在外形和用途上都有不同。二者在建筑体系、风格和材料上新老区别甚大，落成后在法国建筑界也曾引起争论，认为作为一个建筑群的协调调整，其间不应有显著差异。

草地：刚才我们谈到了建筑与社会的关系，我认为建筑学的意义完全不限于自己的学科分野，可以对社会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例如现在很多人出门旅游，看到古建筑只知道拍照打卡，却不懂如何欣赏细节，或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建筑常识、建筑审美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公众素养去培育、去普及？是否可以作为建筑学界的社会责任？

刘叙杰：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全国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建设高潮，然而也引起一些思考。

一个是高层建筑，常常被视为当地是否兴旺繁荣的标志。其特点是建筑占用土地较少，建筑面积与空间增大，容纳人数增多，但有时也会出现若干问题，如外墙采用钢化玻璃，虽然重量减轻，但因其散热、吸热性能，大大增加了该楼的维护费用。若使用茶色玻璃，不但影响视线，而且还增加了光污染。除设计时已留有足够停车位，大楼周边空地有限，不能多停车辆。高层防火除内部灭火设施外，周围使用云梯高度及位置是否合适？事先须有预案。

另一个是乡村民宅，农民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因此返乡新建家屋成为风尚。但其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在建筑外观上，五花八门，有的完全无视周边环境，以金碧辉煌、面积巨大为荣……情况较为混乱。特别是沿公路两旁，大大破坏了原有乡村风貌。

还有一个是建筑风格，绝大多数来自民族传统，但也有相互交流、借鉴，然而不是盲目抄袭。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进步，以及新技术的出现，都对原有建筑形制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要盲目抄袭，而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变革寻找符合自己国家民族特性的新建筑风格。这个探索，对全世界的建筑界都是一个难题，但也有了供借鉴的实例，如阿拉伯的若干建筑。

殉国 81 年后，一位抗日烈士的家书在日本史料中被发现

本报记者段菁菁

一位在**东洲保卫战**中殉国的年轻烈士牺牲81年后，他的家书在日本的历史资料中被发现。由此，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逐渐被揭开。

收到家书一个月后，他壮烈殉国

这是一封父亲寄给前线儿子的家书，家书的发现者是杭州抗战历史研究者何明敏。他告诉记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老兵曾通过回忆录的方式记录战争，这些回忆录后来成为珍贵史料。2019年，何明敏买到了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第八十五联队史《军旗之下》，家书便是在这本史料中找到的。

年轻烈士名为王晋藩，他的家书出现在其中一篇名为《哀悼青年军官王晋藩君之死》的手记中。家书同页，还有一张王晋藩的照片。而手记中曾参与东洲保卫战的第85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桥爪辰男少尉之手。

东洲岛是杭州富阳东部富春江下游江中的一个沙洲，抗日战争期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军民抗战的前沿阵地。1939年3月，日军

进攻东洲岛，东洲保卫战爆发。

据《杭州抗战纪实》记载，东洲一役虽取得最终胜利，但中国部队损失惨重，伤亡二百余人。而根据桥爪辰男的手记记载，**家书与照片是其部下在王晋藩遗体上发现并带回的。**

“承韶吾儿：收阅昨接来函，知汝在富阳大源见习，皆获平安，于心深慰。刘家内皆得平善，无庸远念。惟汝母亲见汝年少远方见习，辛苦异常。更兼时局未定，无时无刻皆是忧虑于汝。切要体谅（体谅）父母爱汝之心，在外见习，千万见机而作，心中格外特别谨慎，诸事皆要思想进退，勿任意故强。诸凡切要留心，以免疏忽之虞。天气严寒须要加衣，须要时常寄信安家勿误为要。尚此并询。近佳。父字。”落款时间为“古历十二月十八日”。

家书全文不足200字，但由字迹可见王父颇具书法功底。根据时间推算，在收到父亲这封家书一个多月后，王晋藩壮烈殉国。

日本军官叹他“为悠久大义任务而献身，生死已被超越”

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在半个多世纪后浮出水面，引起不少历史学者的关注。桥爪辰男的手记并未记述王晋藩的经历，而

是围绕这封家书展开。他这样写道：“父亲王先生的信中，充满了对远离父母膝下，忍受异常辛苦在军中服役的王君的爱戴，父母切切之情，何其珍贵！正是时局不安定，天气趋向严寒的时候，要多穿衣服，保重身体。”

“家书抵万金。在战争年代，家书象征着平安。”亲历日军三次侵占的83岁温州老人韩永龙在了解这段历史后感叹，这封家书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书信中不仅道尽了父子家国情怀，更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于和平的期盼，对战争的厌恶，字字令人动容。

温州抗战史研究者王长明分析，桥爪辰男在手记中将王晋藩的爱国、参军、殉国，与自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到参加侵华战争经历相类比，这当然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但诚如他所言：“（王晋藩）在悠久大义中献身的任务面前超越生死，你的魂魄将久远地活在我的灵魂里。”这其中所流露的，不仅有对这位中国烈士的敬重和敬佩，更有同为人类、同样初入军旅的物伤其类与惺惺相惜。“王晋藩刚出校门，尚在见习期就赴死沙场，这可能是他经历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恶战；桥爪辰男也是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不久，东洲之战也是他的首次参战。”

桥爪辰男在手记的最后写道，“因为这件事，

我后来的中文名字就叫王晋藩。”这让何明敏颇为感慨，“一个中国见习军官的家书和照片被一个日本军人保存在身边，直到数十年后编著其所任部队战史时才拿出来，足见此事对他的触动之深。”何明敏说，桥爪辰男们是杀害王晋藩烈士的日军入侵者，但这封家书也一定程度感化了入侵者，让他开始反思那场战争。

多方接力寻后人 盼望家书早“回家”

这封家书公之于世的同时，历史学者们也不禁思考，王晋藩的父母当时是否获得爱子殉国的消息？王晋藩长眠于何地？家书是否仍被桥爪辰男后代保留？有没有可能将家书归还给王晋藩后人？

今年4月，王长明在温州地方文献中找到了更多关于这位年轻烈士的线索：

王晋藩，字承韶，1921年出生，福建福安人。他生于书香家庭，1935年秋入温州中学初中部学习，1939年1月从温州中学毕业。毕业后王晋藩主动从戎，在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第一支队第四大队第十一中队见习，同年3月21日至23日期间在东洲岛战斗中殉国，牺牲时未

满18周岁。核实身份后，学者们又从浙江温州寻至福建福安。在1940年12月出版的《福建教育通讯》上确认：王晋藩以身殉国后，王晋藩之父王景仁将抚恤金三百元捐献给福安县抗敌后援会，该会呈请总会予以嘉奖。

在经过多方接力寻找后，何明敏、王长明等人还找到了王晋藩胞弟的后人，目前供职于中国矿业大学的王一凡。“曾听父亲讲过有一位伯父是革命烈士，但因时间太久久远已无法寻。”王一凡听说伯父的事迹后非常激动，也希望能见到温州、富阳两地走走看看，寻觅先辈足迹。

“我曾发现过不少史料，但最终能找到历史事件后人的情况不多。即便有幸找到后人，大多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何明敏说，王晋藩烈士的后人能在短短数月内找到，实属惊喜。

遗憾的是，王晋藩的长眠之地至今尚无法确认。只有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在东洲北支流北岸白鹤埠头落成的“历昭亭”，祭奠着东洲保卫战的忠烈英魂。

目前，王长明已经与旅居日本的学者联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找到桥爪辰男的后人，找回原件，让家书“回家”。